

一、民国文学概述

中国民国文学史，是指从 1911 年辛亥革命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它是中国文学从近代跨入现代的文学史。期间又划分为“民国初期”、“‘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和“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四个时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但是近代中国在昏庸腐朽、媚外卖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不屈不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民国文学，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民国以来的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我国古代近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吸收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成份。民国文学，自然包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省和港澳地区的文学。

民国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不平衡现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各个文学部门发展不平衡，内容与形式、表现手法发展步调的不平衡，等等。但从它的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还是明显地分出阶段来：民国初期，是新旧交替杂陈的过渡期，它是近代文学的尾声、现代新文学的前奏，章太炎和南社柳亚子等作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兴起，是现代文学诞生、成长期，出现

现了现代文学奠基作家鲁迅、文学巨匠郭沫若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流派的作家，形成第一个创作高峰；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兴起，是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期，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巨匠大师与“左联”、东北作家群、新月派、现代派、京派等形成第二个创作高峰；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后，是现代文学的革新发展期，由于政治和战争等多种原因，出现了国统区、解放区（抗战期间还有上海“孤岛”和沦陷区）和港台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文坛上出现“文协”、七月派、讽刺文学和解放区的人民文学，形成第三个创作高峰。

民国时期文学是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的社会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复杂的。民国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民主主义的、积极进步的、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同消极落后的、封建的甚至反动腐朽的文学相斗争的过程，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前者。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它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崭新的文学。这是民国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二、民国初期文学

民国初期的文学，是指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文学革命兴起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包涵了丰富复杂的内容。它是近代文学的尾声、新文学的前奏，带有过渡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社会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清政府昏庸腐朽，媚外卖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穷凶极恶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社会危机四伏，矛盾尖锐复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接连不断发生。到1910年出现高潮，发生的次数之多、波及的地区之广都是空前的。这进一步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发动的革命活动也不断发展，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11年（辛亥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次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巨大胜利。但

是，在这胜利之中也包含着危机和失败。因为它并没有触动旧封建统治的政治机构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的胜利果实，立即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所窃取，中国又陷入黑暗混乱的局面。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复辟倒退丑剧一幕幕上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随之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起来，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成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力量，为后来新的文化、文学运动的兴起作了准备。民国四年（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倡导新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很快得到了响应，形成巨大的潮流。民国六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世界和中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类的未来。于是，一场伟大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就逐渐兴起来了。

（二）文学的状况和特点

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局不稳，反映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从二十世纪初至“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涨时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的兴盛期。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创刊，还出现了像南社这样的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社团，进步文学进一步发展，一些封建、腐朽的文学遭到抵制和打击，文学创作注意群众性和通俗化，白话文出现。但是民国成立后不久，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

辟，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落入低潮，作家队伍发生分化，有的作家颓唐、悲观，有的由没落走向反动，也有一些仍在继续探索。这期间，文学上的复古势力抬头，消极、落后的东西增长。辛亥革命以前出现的以消遣、游戏的态度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鸳鸯蝴蝶派，这时大为兴盛；而以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为特点的谴责小说，这时沦落为“黑幕小说”。这是进步文学和封建落后文学同时并存的局面。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兴起，才彻底改变了这一状态，出现了新的面貌。

民国初期的文学，虽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文学，但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和鲜明的特点。这个时期的文学，紧密结合现实，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些作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像章炳麟、南社的柳亚子等，他们努力用自己的诗文为民主革命服务。这个时期的作品，描写的题材比较广泛，内容比较丰富。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描写劳动群众贫困痛苦的，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罪行的，有暴露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昏庸的。反帝反封建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基本主题，也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主流。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与过去传统文学相比，无论是内容、形式或是表现手法，都有一定的变革和创新，呈现出新的色彩，文学形式也在向着通俗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

（三）外来思潮和外国文学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的炮舰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状态。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西方的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化思想大量介

绍到中国。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和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在哲学思想方面，中国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学派中，达尔文进化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次宣传介绍进化论的高潮；到辛亥革命时期，又一次掀起宣传进化论的高潮。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章炳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把进化论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中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也是早已开始，到清末民初已进入较为自觉的和大量译介的阶段。它对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近代欧洲的文学思潮，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等积极浪漫主义诗人。鲁迅认为他们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人，并想借用外国文学来向中国传统文学挑战，希望能出现精神界的战士，开创中国文学的新局面。当时较有影响的译著有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人翻译的拜伦、歌德、席勒等人的诗歌，鲁迅、周作人合译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家中，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福建闽侯人）是最著名的了。他是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从他最早的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起直到逝世二十多年中，一共与人合作翻译了各国小说171部，共270册。他译的小说在民国初年前后风行一时，流传全国，影响很大，鲁迅、郭沫若等人当时都很喜欢读他译的作品。

外来思潮和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向广大读者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使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向，吸取、借鉴西方有益的东西。

(四) 柳亚子与南社

柳亚子(1887—1958年)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字亚子,江苏吴江人。幼年受家教,学古诗,十四岁时开始发表诗歌习作。早年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不久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积极从事诗文创作。1906年加入同盟会,同时又加入光复会。1907年去上海,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结社之事。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被选为书记员。此后历任南社的编辑员、主任等职。

“五四”运动时,同情新文化运动。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月,与邵力子、陈望道等人组织新南社。次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逃亡日本。次年回国。抗战前期留居上海,后赴香港。

柳亚子是南社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素有“南社灵魂”之称。他一生坚持革命,不断前进,是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爱国诗人。他重视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反对晚清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诗派。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诗人,他的诗作多为政治抒情诗,紧密联系民主革命,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激情,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深刻的现实性,感情真挚强烈,情调激昂奔放。他的诗歌在反清反袁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和晚清“同光体”诗派的斗争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放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示祖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吊鉴湖秋女士》是作者得知秋瑾牺牲的消息后所写的悼念诗,诗歌沉痛哀悼秋瑾的被杀害,赞扬她坚强的革命意志。情调悲壮雄浑,感情真挚深沉。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大搞独裁专制,并于民国四

年(1915年)复辟称帝。柳亚子于同年写了《孤愤》诗，愤怒斥责图谋称帝的袁世凯，无情抨击拥戴袁世凯称帝的趋炎附势者倒行逆施的行径，表示了要把革命救国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五四”以后他的创作进入新时期。

南社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发起人是同盟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17人出席成立会，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成立会上，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南社的活动中心在上海，它的宗旨是直接配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诗文“鼓吹新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宣传推翻清王朝，为实现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柳亚子后来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明确指出：“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廷的标志了。”^①1911年，绍兴、沈阳、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鲁迅曾参加越社。

南社成立之前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08年1月，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次年，正式成立。

南社主要成员都是同盟会员，故有同盟会“宣传部”之称。辛亥革命后，社员人数大增，总数达1180多人（一说1200多人）。南社成员，在辛亥革命前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有的成员直接投身革命斗争并作出了牺牲。民国初年，南社得到了顺利发展。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资产阶级革命派溃散，南社发生分化，有的社员依附袁世凯，有的社员坚持反袁斗争，但情绪消沉苦闷。民国六年（1917年），社内发生争吵、内讧，民国十二年（1923年）解

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见《南社纪略》。

体。以后，柳亚子、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新南社（1923年）出版社刊《新南社》一册。民国十四年（1925年）柳亚子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止。1924年傅专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活动到抗战爆发前夕。1943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活动了一、二年。

南社初期，集中了当时活动于东南各地的一批爱国青年文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文学上，诗歌、小说、散文、戏曲和翻译文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等。

南社的机关刊物是《南社丛刻》简称《南社》，1910年开始出版，发表社员的作品，分诗、词、文三部分，每年出二至三集。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共出版二十二集。民国六年（1917年）出版《南社小说集》一册，是《南社丛刻》的增刊。南社的各分支组织曾计划出版刊物。其中，越社的机关刊物《越社丛刊》（鲁迅编辑）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仅出一期。

南社文学以诗歌创作为主，大体可以民国成立为界。民国成立前，他们的诗歌大多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谴责清朝专制统治，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充满了慷慨激昂的革命气概。辛亥革命失败后，有的社员产生了悲观情绪，在诗作中抒发了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但大多数社员投入反袁斗争，口诛笔伐，痛斥袁世凯复辟称帝和对革命志士的镇压。后来南社分化，一些成员颓唐避世，诗风愤郁低沉。南社在推动反清的辛亥革命和反袁称帝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南社在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 诗 歌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成员为代表的一批作家。

章炳麟(1869~1936年)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早年受维新派的影响,后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曾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五四”运动后,思想日趋保守倒退。文学上,他作诗不多,早期的一些短诗,富有革命激情,为当时的人们所传诵。《狱中赠邹容》抒发了作者深沉的爱国革命感情。《山阴徐君歌》,作者以无比愤恨的心情,抨击了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者,而对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徐锡麟表示崇敬和赞扬。他的一些通俗的革命诗歌,如《逐满歌》影响也较大。章太炎的政论散文,多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相联系,内容充实,结构严密,有较强的说服力,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影响和成就超过他的诗。

南社诗派的主要诗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宁调元、马君武、周实和苏曼殊等。

陈去病(1874—1933年),原名庆林,字佩忍,后改名去病,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早年倾向维新变法,后转向民主革命;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与柳亚子、高旭发起成立南社;辛亥革命后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他的诗多忧愤国事、宣传革命,抒发振兴中华的壮志,诗作功力较深厚,情绪激昂慷慨,风格质朴苍健。一些描写山河壮丽的诗篇,也别具韵味。《访安如》抒写作者同柳亚子的深厚友谊和对革命党人遇害的无比哀痛与愤慨,

充满了昂扬奋发的革命精神。《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借景抒情，表现了作者踏上征程的豪迈气魄与自信。

高旭(1877—1925年)原名厚，字天梅。江苏金山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9年与柳亚子、陈去病发起成立南社。辛亥革命后思想渐趋倒退。他早年写过反对封建礼教、歌颂前朝抗敌英雄的诗。他写得较多的是抒发自己爱国思想、革命情怀的诗。《路亡国亡歌》是一首著名的反帝长诗。揭露帝国主义以筑路为名搞扩张的政策。《元旦》(1913年元旦)批判、讽刺了投机革命的人和当政的官僚，也抒发了作者失望、忧愤的心情。

宁调元(1883~1913年)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07年在岳阳被捕入狱三年。在狱中作诗几百首，并致书高旭参加筹建南社。辛亥革命后因参加讨袁活动再次被捕，不久就义。他是南社的著名诗人之一，诗歌慷慨悲愤、沉郁雄浑。《感怀》抒写自己的革命抱负，表达了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精神。《武昌狱中书感》抒写了作者决不向封建专制势力低头、甘愿为革命献身的斗争精神。

马君武(1881~1940年)原名道凝，字厚山，一字君武。祖籍湖北，祖上后迁居桂林。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南社著名诗人，诗作多鼓吹新学思潮，宣扬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从军行》抒写中国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京都》表达了决心改变中国黑暗现实的愿望和表现了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

周实(1885--1911年)原名桂生，字实丹。江苏山阴(今淮安)人。1909年加入南社。辛亥年武昌起义后回家乡去发动民众响应，不久被反动知县杀害。他是南社著名的青年爱国志士，诗

作也很多。他的诗充满革命激情 诗风雄劲奔放 自然明快。《拟决绝词》作于 1910 年，是诗人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预作的绝命词。

苏曼殊(1884—1918 年)原名玄瑛 字子谷 法号曼殊。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 生于日本。南社作家。辛亥革命后悲观消沉。他的诗 多为七绝 抒写忧国忧民之情 情调低沉。《淀江道中口占》描写日本淀江道上的美景 清新自然。《东居杂诗十九首》借写秋景，表达自己苦闷心理和为国忧伤的感情。

(六) 小 说

近代文学中，小说创作繁荣，尤其是近代的末期、辛亥革命前后到民国初期 作家云涌 作品数量大增。当然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小说创作也呈现新旧交杂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存在封建的旧文学和消极、落后的东西。“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出现 就是消极、落后东西的集中表现。但对“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作品 也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不应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比较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具有进步倾向和新的色彩的小说也在不断涌现。

曾朴(1871—1935 年)字孟朴 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1904 年开始文学活动，1909 年进入政界，民国十五年(1926 年)又弃官从文。他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孽海花》。《孽海花》的始作者是金天翮 他先写了头六回，于 1903 年在中国留日学生办的《江苏》月刊上发表第一、二回，后由曾朴续写。1905 年发表前十回，次年发表第二个十回，1907 年又发表至二十五回。民国十六年(1927 年)作者又续写二十

六至三十五回，并对全书作了修改。最后的修改，削弱了原书的思想内容。《孽海花》以清末的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即赛金花的故事为主要线索，描写晚清三十年间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这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但也存在着缺点。

黄小配（1872—1913年）又名世仲。广东番禺人。早年积极宣传反清主张，同盟会会员，后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杀害。他所作小说有《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和《五日风声》等。《五日风声》原标“近事小说”实际上倒像是一篇报告文学。全篇三万多字，原载于辛亥年（1911年）广州出版的《南越报》。它以事件的发展为线索，具体记述了辛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的全过程，迅速及时地反映了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而进行决死的斗争，颂扬了革命党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品也注意刻画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英雄群像。

苏曼殊，南社诗人，也是小说家。辛亥革命后，他致力于小说创作，从民国元年（1912年）起，陆续发表了六种文言小说。《断鸿零雁记》类似长篇。描写男主人公三郎家遭衰落后，未婚妻雪梅被继母迫嫁富户，三郎削发为僧。后三郎赴日本寻找生母，与姨姐静子相遇，也有恋情，终因皈依佛法，只得割断情丝回国。这时雪梅已绝食而死。此外还有《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他的小说大多描写爱情故事，从男女主人公争取自由、幸福的爱情方面，触及到了反封建的主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常写得缠绵悱恻，感伤情调浓重。

恽铁樵（1878—1935年），名树珏，别署冷风、焦木。江苏武进人。1910年创办《小说月报》，任主编至民国七年（1918年），颇

有文名。同时也写作小说。后弃文习医。短篇小说《村老嫗》通过老嫗对其儿子的斥责，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辛亥革命以后所谓民主选举的虚伪性。《工人小史》是一篇较早也是较好地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作品通过集中描写技工韩人两天的工作，反映了他的悲惨遭遇和工人们的痛苦生活，控诉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

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从多方面反映和揭示了当时社会现实。鲁迅的《怀旧》（1913年）揭露了农村封建地主对辛亥革命的恐惧和封建教育的腐朽。叶圣陶的《穷愁》反映了工人的悲惨生活。韦士的《卖花女》描写一卖花女为了患病的母亲卖花、为了安葬母亲卖唱，结果她的血泪钱被掌院者所掠取，她被卖给妓院。最后她的生命与爱情都被黑暗社会剥夺了。作品爱憎分明，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觉迷的《不倒翁》描写一极善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不倒翁式的人，由差役变为绅士，还当上议员。作品对这类人物的卑劣伎俩和丑恶嘴脸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嘲讽。许指严的《“猪仔”还国记》揭露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拐骗华人去美当劳工，把穷苦百姓当作“猪仔”贩卖到国外。周瘦鹃的《真假爱情》描写一个忠于爱情但更忠于革命、热爱祖国的革命战士批判了自私自利的“假爱情”歌颂了纯洁诚挚的“真爱情”。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直接记叙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大事件的长篇作品，像描写黄花岗起义的《广州乱事记》、反映武昌起义的《血泪黄花》等。

三、“五四”文学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1. 新青年 创刊和新文化运动兴起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新的思想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一些受了西方科学文化和新思潮影响的先进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广泛开展思想启蒙、向民众宣传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纲领性的文章《敬告青年》，提出“六义”主张，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后来，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坚决地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

文学。”并且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专制主义、旧的思想文化和孔教儒家学说发起猛烈的批判攻击，宣传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和社会进化论。在陈独秀、李大钊和《新青年》的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一支文化革命的大军。他们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计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我之爱国主义》、《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孟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青春》、《孔子与宪法》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

民国六年（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次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周作人、高一涵等人参与编辑工作。这一年十二月，陈独秀、李大钊等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此后，又陆续出现了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少年中国》，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的《新潮》，王统照等人创办的《曙光》等刊物。它们都与《新青年》采取同一步调，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日益扩大，队伍也不断壮大。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在伟大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使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发展并发生质的变化，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民国八年（1919年）胡适接连发表了《实验主义》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宣扬改良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现

象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批驳。“五四”以后，知识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参加者思想政治上开始分化，有的随着时代前进，突破了先前的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樊篱，开始了新的探索，成为革命者或马克思主义者；而有的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甚至于倒退了。

随着思想文化革命的展开，一场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也就应运而起了。

2. 文学革命的倡导与兴起

文学革命开始于民国六年（1917年）最早的倡导者是胡适和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次年他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把原“八事”中的一些条文作了修改后成了“八不主义”并提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的文章比较温和谨慎，集中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要使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把改革语文工具看作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目的。陈独秀在《新青年》（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鲜明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篇文章是文学革命的宣战书。他的“三大主义”以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主张，尤其强调文学